

龚建平 著

# 意义的生成 与实现

——《礼记》哲学思想



商务印书馆

#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

——《礼记》哲学思想

龚建平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

2005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意义的生成与实现——《礼记》哲学思想/龚建平著.  
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  
ISBN 7-100-04440-5

I. 意… II. 龚… III. 礼记—哲学思想—研究  
IV. K89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4975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  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意义的生成与实现  
——《礼记》哲学思想  
龚建平著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

ISBN 7-100-04440-5/B·638

---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× 1168 1/32  
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/4  
印数 4 000 册

定价:25.00 元

## 作者简介

龚建平，男，四川宣汉人，1962年6月生。1983年6月毕业于四川南充师院，获哲学学士学位，1988年6月在陕西师大获哲学硕士学位，1998年6月于武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，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。主攻中国哲学，特别是儒家哲学。已出版《梁漱溟哲学思想》（合著）等著作。在国内外各种杂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。

## 序 一

龚建平是一位深沉的学者，好学深思，潜沉读书，语言不多，学问求进。他默默耕耘于玄圃二十余年，于中西哲学极深研几，多有创获。记得他曾在台湾的《哲学与文化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言说的学术论文，被曾在欧洲莱顿大学工作的专家选中，译为英文，收入到2001年春在纽约出版之学术刊物《当代中国思想》总第32期（“语言与哲学”专集）上，以广流传。由是可知他的学术论文的分量。

“文革”之后，恢复高考不久，建平即在家乡四川南充师院（今西华师范大学）读大学，后到陕西师大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生班学习，获哲学硕士学位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为研究哲学问题，建平于1995至1998年来到武昌珞珈山攻读博士学位，毕业前被著名学者、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、业师萧蓬父先生看中，留校任教。三年后，因其夫人的调动问题得不到解决，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，回到西安，执教于西安交大。这是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事情。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力求找到自己的入路。

他的博士论文《〈礼记〉哲学思想研究》于1998年经海内多名专家评审、答辩，以优秀成绩获得通过。同年获得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6年来，建平不急于出版其博士论文，一直关注海内外学

## 2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

术界关于《礼记》的研究成果,关注新出土的简帛研究的新成果,潜心读书、修改、补充,有相当部分甚至重写。现在与大家见面的《意义的生成与实现——〈礼记〉哲学思想》,是作者九年来苦读精思的结晶。

“礼”综合了宗教、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艺术、美学的价值,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。“三礼”号称难读,有关“三礼”的研究,几成绝学。幸好在今天,经学研究刚刚有了复苏之机,学术界有人开始董理“礼”学。对我们哲学史工作者来说,《礼记》是非同一般的文献。然而全面认真地把握它以及相关文献的学者并不多见。

“五四”以来流行的有关“礼”的误解,是需要澄清的。例如关于所谓“礼不下庶人”,大家认同的解释其实是大有问题的。据孙希旦的注释,“礼不下庶人”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,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。古时制礼,自士以上,如冠礼、婚礼、相见礼等都是士礼,庶人则参照士礼而行。庶人的冠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降低,故“礼不下庶人”其实是从实际出发,使庶人在仪物诸方而量力而行。“礼不下庶人”绝不是可以不尊重庶人。我们知道,孔子批评有的为政者对百姓“动之不以礼”,强调爱惜民力,“使民也义”,“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”。《礼记·曲礼》则主张以德为贵,自谦并尊重别人,讲究施惠与报答,礼尚往来。无论富贵或贫贱,都互相尊重,互利互惠。《曲礼》尤其重视对于负贩者、贫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。

又如所谓“吃人的礼教”说,自戴东原以降,尤其是“五四”以来几成定论。徐复观先生对此予以批评,指出:“即使在封建时代,礼也是维系‘人地’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,而不是吃人的。封建

的宗法制度,主要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;礼即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,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。这与由法家只有尊尊而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,绝不相同,在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。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仪,而思另有所制作,其根本原因在此。”<sup>①</sup> 礼教,特别是宋代以后的礼教,包括吕子乡约、朱子家礼在内,恰恰适应了历史上的社会转型,有利于民众的文明化,对中日韩诸国走上现代化都作了铺垫,其中有其现代性因素。

本书作者全面地研究了《礼记》文本及与《礼记》相关的先秦两汉文献,特别是郭店楚简等资料,从哲学问题的反思出发,深入探究了礼仪、礼制、礼文化的起源、结构、功能、价值,尤其是《礼记》呈现的意义世界。作者有关《礼记》的天道观、宇宙论、人生哲学、政治哲学,以及《中庸》的形上学与《乐记》的文化意义的解读,极富创见。

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,我向读书界极力推荐本书。我认为该书有三大新见:

首先,作者把礼视为承载着社会性的既有价值内容同时又充当中介的“密码”符号。他认为这种“密码”有时间上的“遗传”性和空间上的普遍性。礼可以统括并简化为两个基本要素:作为符号化、形式化了的人类活动的“中介”;以个我理想人格为基本单元的价值指令和行为方向预设。这两方面使礼既成为社会性的遗传密

---

<sup>①</sup> 徐复观:《中国思想史论集》,台北,台湾学生书局,1959年初版,1993年第9次印刷,第237页。

#### 4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

码又是个我与外界连接的通道。礼具有人为性、成长性、形式化和自调性等特点。所谓“人为性”，即礼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。作为社会产物，礼是个我社会化和能够“立”起来的根据。所谓“成长性”，是因为礼作为个我与天地、个我间交往的中介系统，和任何其他中介一样，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成长而成长的，具有累积性的特点。这种成长性使作为中介之礼不断叠加和生成。所谓“形式化”，指礼虽是由具体历史境遇中产生出来的，但它作为有自身独立性和抽象性的人化物，有不依赖于特定时代或条件的流通性。所谓“自调性”，指礼因其相对的独立性所决定的自我修复、自我完善的性质。相对于不变的“经”而言，有“权”作为其修正和补充；而对于时变而言，又有不变的“经”作为原则。

第二，作者着力诠释了“礼乐相成”开显的人的意义世界。作者认为，人生的根本在于其“意义”。“意义”，不是个我或部分人的“意见”、“意欲”，而是“意”之合宜或符合“义”。这是主客观的统一、个我与社会的统一。欲达“意”之宜，故需“诚意”。礼出于仁义，礼才能表达善的客观社会性和个我与社会的统一。《礼记》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，以整体性、相关性的视界看待社会与人生。“共生性”体现人们之间相互的依赖性，“互生性”所揭示的是主体各自相互作用的能动性。但是，“人道”并非仅是“人”之道，“人道”不离并必须体现“天道”。“人道”既是“天道”的落实又是人之为人的要求与实现的具体途径的统一。在作者看来，如果说礼为意义实现的原则，那么，乐就是意义生成之本源。乐是礼乐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。人心真“乐”才能相“感”，相感方可谓之“生生”。乐为天地之和，就因它是生生之德



的基本点，其实也就是意义的共生与互生之源。礼乐教化的精神文化意义，在于体认人生的精神层面的高级需求。礼所提倡的格调与品质的要求，乐所提倡的真善美的情调，对于并无普世宗教关怀的社会中人格的自我完善而言，有着不可忽视的普遍社会价值。为了防止自我主观主义的膨胀，礼乐制度作为客观化又是被提倡的社会公有价值，能够起到抑制、调节自然本能欲求的作用。礼乐教化对于人与物、人与天的关系的协调有积极的作用。作者指出，礼乐教化虽然基于宗族社会本位而产生，但是，即使在原有宗族消失之后，其所承载的普遍的人文道德意义并未丧失，通过自觉的改造，可以弥补个人本位的社会所可能造成的人际道德的缺失，填补仅靠法律“免面无耻”所遗留下的巨大道德真空，因而具有现代意义。

第三，作者透辟地说明了“礼”所代表的政治与“礼”之政治学的内涵。他指出，“以教化政”是礼教的重要内容。为“政”之本在“爱”、“敬”，即是把政治建立在一种人性之情的基础上。这里的情，与其说是普通的血缘亲情，不如说是基于而又通过它所透显出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、宗教情怀。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才能理解作为教化体系中的修养功夫如“反躬”、“絜矩之道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慎独”等的意义；也只有在教化体系中，才能体会礼乐文化的真实意义。无论是被“教化”了的“政”，还是以“政”的形式出现的“教”，都说明儒家的理想政治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。在“以教化政”的基本目的支配下，对天地的信仰，宗族祖先的崇拜，以及原始氏族的某些平均主义思想，均被《礼记》拿来作为节制现实政权可能膨胀的资源。从礼乐教化的实际社会政治作

## 6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

用看,由于对底线伦理的强调,它至少从形式上起到了分割专制权力、约束个人行为的作用。秦汉以后统一国家的形成,普遍世俗化的宗族的出现与儒家理想的礼乐文化,从现实和观念两个方面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形成对权力的有限限制。随着儒家在汉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,一定程度上说,自我节制也是专制统治不得已的选择。

除以上三点之外,作者有关“乐”与“情”的讨论也非常深入,发人之所未发。

如前所述,我注意到作者有关“礼”寓含的宗教性、终极性的讨论。作者认为,礼之人文性是包含神性的人文性。人的神性是我真实生命之意义相生的前提。我们在考察春秋时代的“礼”与“礼乐”时,不能不看到其宗教的、终极层面的根据。在孔子以前,在孔子时代,甚至到战国末年的荀子,无不讨论“礼”的本源的问题。“礼本乎天”,这是三代大的文化传统的直接继承。《礼记·礼器》:“礼也者,反本修古,不忘其初者也。”“礼也者,反其所自生;乐也者,乐其所自成。”又,春秋时代“礼”的宇宙论意义也不容忽视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公孙吉引子产所说的“夫礼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”。以礼为依归,其实是以天地的秩序为依归。礼是那个时代各国应当共同遵守的义法。据饶宗颐先生研究,《左传》中“礼”字出现的频率可与印度《梨俱吠陀》中 Rta 一字出现的频率相比拟。《吠陀》的 Rta 指天地的秩序,代表礼仪上道德上的宇宙性的经常之道。“它和‘礼’表示天经地义的‘礼经’,有点相似。一谈到‘礼’,很容易把它说成礼仪、礼节,把它翻成 ritual,但春秋以来的儒家(如叔向、晏婴)以至初期的法家(如子产)都给予

宇宙义。这一点是需要重新认识和加以抉发的。”<sup>①</sup> 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是合拍的。正如本书作者所说,礼教主张的“大礼与天地同节”、乐教所强调的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对于未来社会仍不失其思想的光辉。文明富裕的社会就要求人人都要有“节”,人人有节才可能“同和”。

建平是我的亲密的学术伙伴、合作者,也是心心相印的同道。他与我合著《梁漱溟哲学思想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6)。那部 26 万字的专著,主要是由他撰写的。在我与同仁合著的《诸子学志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)中,他撰写了第五章“法家”。在我主编的“中华百家人生智慧丛书”中,他独立撰写了《自救与放达——道家的人生智慧》一书(武汉出版社,1998)。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,除独立为本科生开“中国哲学史”、“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”、“文化学概论”等课程外,曾与我合作为研究生开出了“宋明理学研究”的课程,并在我主编的《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》(人民出版社,2004)中,承担宋明儒学名著的注释工作。在我主编的《宋明理学与长江文化》一书(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4)中,他撰写了八、九两章,论述杨万里、魏了翁、真德秀、黄震、金履祥等人的学术思想。在近年来有关儒家伦理的争鸣中,他又与我合写了《“德治”语境中的“亲亲相隐”》一文,发表在《哲学研究》2004 年第 7 期上。在我主持的好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,他都宣读了论文。他是心地善良、真诚不苟的君子。他有深厚的学养,问题意识很强,善于思想

---

<sup>①</sup> 饶宗颐:《〈春秋左传〉中之“礼经”及重要礼论》,载陈其泰等编:《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》,学苑出版社,1998 年,第 472 页。

## 8 意义的生成与实现

的反思。与他为友,是我的荣幸。我十分感谢他对我的支持与帮助。

近些年来,我为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开了一门课,叫“《礼记》会读”,以孙希旦的《集解》、朱彬的《训纂》为主要教材,与博士生们一块儿读,连同注笺,一个字一个字,慢慢读下来,再参读百年来专家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,讨论,消化。我把这个课排在周六,方便已毕业的在本市工作的博士们回来一起读书。会读的方式,在我国古已有之,今天在日本学界仍然盛行。我与我的学生们想把《礼记》会读坚持下去。在会读的过程中,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。

是为序。

郭齐勇

2004年国庆节于武昌珞珈山

## 序 二

龚建平撰《意义的生成与实现——〈礼记〉哲学思想》新成，请我作序。喜读本书，知其属稿之始，乃其 1998 年于武汉大学完成的“博士学位论文”，此为修改稿。早在 1985 年，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”硕士班上，我们就开始了师生情缘；1989 年，我受聘浙江大学教授，后来，他又去武大继续深造，十五年间，虽未谋面，但他身上涵养的率真天性，尤其是对礼学知难而进的钻研精神，难以忘怀。很想写点有学术深味的心得为序，但礼学问题非三言两语可述，近来坐功又欠佳，只好取便当年所撰“评阅书”之思路，仅就本书主题意义，略叙一二，以乐观其成。

古谚有曰：“学如牛毛，成如麟角。”反思上世纪 80 年代，我曾躬身其中的“中国文化大讨论热潮”所带来的后果，固然，一方面，基本改变了中国学人长期固守的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二分对立之思维定势，开始以“文化”或“文明”为思考范式，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，视为通向现代化未来世界的一条必由之路，此乃积极成果无疑也。但另一方面，却导致世纪之交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“假大空”的浮躁风气，甚而还冒出了不少所谓专搞“宏观学问”，以发表所谓“前瞻、回顾”或“总结、清理”之类高论而起家的学术“暴发户”。正如时贤所议论：这些人自以为最得计的是，猎取和生造一些似是而

非、似新而旧的词句，“常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纵横开阖，谈古论今，却很少深入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微观个案。这一潮流汹涌而至，使许多人被裹卷而下，迷失了方向。”（参见《文教资料》1992年第5期）无疑这是“文化热潮”之后喧嚣一时的污泥浊水，并不代表学术主流。

近年学术界之主流是，沿着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的思路，展开多学科、多视角、多层次、多方面深入而具体之研讨，使它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之主题。本书作者顺乎学界主流，积六七年之功，坚持由个案到一般的治学道路，不为急功近利的“假大空”学风所动，着眼于未来中国哲学现代重构的大方向，从“文化讨论”的积极成果出发，选择了最具有典型意义、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最根本传统的礼，作为创造活动的问题意识，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本穷源，苦思力索，终成本书。其开宗明义曰：

在传统哲学占主流话语地位的儒学中，最具中国特色而又最不能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，恐怕要数“礼”的思想。但是，“礼”又可说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，也是一个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及制度体系，离开了它，我们又如何来解读传统呢？

因而，欲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，自然无法回避礼的问题。但礼确如前贤所叹，是一项“累世不能通，当年不能究”的研究难题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自“周人尚礼，敬鬼神面远之”，到孙中山“以礼

治国”，建“礼俗司”，长达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里，礼乃“天地之序”、“国之干也”（《左传》语），始终支配、控制、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其文明的发展。这就必然造成“礼”这一概念内涵极其庞杂，外延极其广泛，上自学理层面，下至实践层面，既包括名曰“礼制”、“礼仪”、“礼器”，实即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宗教、兵刑等全部典章制度，又涵摄社会秩序、习俗、风尚和思想准则、行为规范等一切所谓“礼学”、“礼教”和“礼俗”。而且，两者互相关联，犬牙交错，共同构成了代代相承、牢不可破的中国礼乐文化传统，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和内在精神。

更为复杂的是礼乐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，除了社会习俗、礼器文物之外，主要是以儒家“十三经”为主体的文献典籍，尤其是其中的三《礼》经籍。如果说，与“礼制”相对应的是《周礼》（亦称《周官》），与“礼仪”相对应的是《仪礼》（亦称《礼经》），那么，与“礼制”、“礼仪”和“礼学”、“礼教”诸方面都有关联的，乃属《礼记》。涉及三《礼》的还有经古今文学、文本真伪、经师家法、传承谱系等极为复杂的经学问题；加之，“古书残缺”，“古制茫昧”，“古文简奥”，“异说纷纭”（黄侃语），更增添了解读之难度。尤其自清末民初始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崩溃，儒学花果飘零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已成定局。时人为救国于燃眉，针对“读经误国”、“礼教吃人”的民族灾难，对“礼学”、“礼教”大槩笔伐；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更是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；及至中国社会转型之今世，礼乐传统、三《礼》经学，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上，仍被等同于封建糟粕，仅是为统治者保江山的，致使在世界倡言实现传统“创造性转化”的诸位知名学者，亦不得不在推行“儒家伦理”的同时，特别声言要先排除作为

封建意识形态的“孔孟之道”(杜维明);或在肯定儒家“仁”学现代意义的同时,提出必须“借助对于‘仁’重新取向,分离传统的‘礼’”(林毓生)。可见,礼是否曾因作为阻碍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封建传统,而就完全丧失了现代转化的文化生机,仍然是当代礼学研究无法绕过的思维屏障,对礼学的平心静气的研究,也就难上加难矣!

本书作者知难而进,选择既涵礼学又摄礼制的《礼记》为研究对象。既不取经学进路,不囿于烦言碎辞,不拘泥于各种新说、旧说,又不简单全盘否定儒家经学,更不取时下流行的上述“二分法”;而是站在学术前沿,适时调整思路,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,在疏理简择前人研究成果及其得失的基础上,结合《郭店楚简》有关记载,考订史料,推断年代,评析异说,辨证源流,以现代哲学、心理学的理论视野,首先重新为《礼记》定位:确定世传《礼记》实际 46 篇,大体出自孔子七十子弟子至汉武帝之前的儒家群体之手,由戴圣编纂成书,郑注孔疏之后,由“记”上升为“经”,其总体思想,呈现了秦汉间儒学融合思、孟、荀,消化诸子百家之趋势;其对“礼”的阐释,集中表现了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人格化与制度化,它看似外在的,而其实是儒家关于人的本质、人的自觉活动、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的文化价值系统与“文明体系”。仁礼难分而实为一体。这一定位的确立,表明本书主旨在于揭示礼的本质,论证“礼义”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,以回答礼乐文化传统究竟有无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根据。

本书取哲学进路,试图对《礼记》作哲学上的整体研究。所以,它“对《礼记》的分类与传统礼家不同,也与朱子所代表的理学家有



异”。而且，“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派系或古今文的分野来处理《礼记》的材料”，更打破了传统所谓的“礼乐派”和“诗书派”之间的严格界线；以哲学的眼光重新检视《礼记》各篇内容，特别重点分析了属之哲学天道观、宇宙论、人生观、心性论、政治理想、礼乐教化等有关篇目所涵之意蕴，不时表露出诸多新的见解，得出了礼的本质存在于“礼的普遍意义之中”的结论。认为礼的本质不是其个别特征，而是人“自别于禽兽”的重要特征之一；它是既具有“报本反始”、“不忘其初”的根源性，而又有人类道德超越性和文化创生性的文化体系。“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”（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），礼是一个人性化的过程，归根结底，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即“人的本质”之体现；无论礼仪形式如何因时而变，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，礼就必然与其同步存在和发展。总之，礼的本质决定了礼乐文化传统向现代转化有其内在的动力和生机。此即本书主题的现代意义之所在。

本书有些观点虽可进一步商榷，但总体上看，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多有创获，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。请读者明鉴。是为序。

陈俊民

2004年大暑序于青岛崂山海岸